

## 历史、现实与艺术的交响

——评长篇传记《赤心擎海·郑成功传》

□王晖

在历史传记的浩瀚星空中，作家张培忠所著长篇传记《赤心擎海：郑成功传》宛如一颗璀璨的新星，散发出独特的光芒。它以独特的视角、扎实的史料和艺术的笔法，为我们精心雕琢出一个“非凡的郑成功”。这部作品绝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传记，它更像是一部融合历史深度、现实关怀与艺术创新的非虚构作品，在历史的长河中奏响了一曲激昂的交响乐。

**史料深掘与叙事新章的交融。**作者在作品的“后记”中，明确且坚定地表明其写作目标是“挖掘与建构”。这一目标犹如一把神奇的钥匙，打开了通往郑成功历史世界的大门。该书不仅深入挖掘了郑成功的历史背景和生平事迹，如同考古学家般细致地探寻历史的蛛丝马迹，更通过建构全新的叙事框架，为我们呈现出一个立体、真实、有血有肉的郑成功形象。

在历史意义方面，为写作该书，作者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踏勘，足迹遍布于郑成功相关的历史遗迹，搜集史料近千种，涵盖了官方档案、民间文献、地方志等多种类型。同时，作者运用古今互证、诗史互参、中外比较等方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在第十章对郑成功死因的分析中，作者不仅揭示了历史真相，更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郑成功生平的新视角。这一分析基于大量原始文献和实地考察，厘清了历史细节，同时引导我们重新思考其生平的复杂性，使结论更加可信和有力。这种写作方法，让历史从尘封的档案中鲜活起来，成为观照现实的一面镜子，让我们能够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更好地理解当下。

在现实价值方面，这部作品更加注重历史事件的现实意义，使得历史穿越时空，映照当下与未来。郑成功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展现出的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对于当今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原始文献的实证力量与真实呈现。**该书的纪实感，很大程度上源于作者对原始文献的忠实呈现。在表现郑成功生平事迹方面，该书大量引用书信等原始文献，使得历史事件更加生动和具体。例如，第六章“清郑和议”中，郑成功致父亲的书信原文，不仅展现了其坚定的抗清立场，更让读者直观感受到历史人物的情感与抉择。这种“以原话说话”的处理方式，增强了作品的可信度与感染力。同时，顺治帝与郑成功往来信函也以原文形式呈现，使得历史事件更加真实可信。这些原始文献的引用，既为作品增添了历史厚重感，也让读者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历史人物的情感和思想，仿佛在与历史人物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此外，该书还附录了600余条参考文献，涵盖古今中外有关郑成功研究的史料。这些参考文献不仅为作品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更体现了作者在全面占有史料的前提下，研读爬梳、综合分析的严谨态度。他努力将历史事件还原到其发生的具体情境中，让读者得以深入理解郑成功的内心世界，使该书成为一部文学价值与学术价值高度统一的作品。

**历史人物的文学再现与精神升华。**《赤心擎海：郑成功传》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更是一部具有重要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在艺术表达方面，作品通过全球战略、海权争夺、国际贸易、民族矛盾、文化冲突等多维度叙事，生动展示了郑成功在明末清初外敌环伺、内乱频仍这一沧海横流的历史画卷中，登高望远、左冲右突，既茫然四顾，又勇于进取的现实困境和精神突围。例如，第五章“经略金厦”中，郑成功收复金门的壮举不仅体现了他的军事才能，更被提升为一段关于成长与觉醒的生命叙事，即作为一个觉醒者和行动者所具备的大局意识和忠诚品格、进取信念和冒险精神。这些性格特质通过生动的叙述和细腻的描述得以展现，使得郑成功的形象更加鲜明立体。在关注郑成功外在成就的同时，作者还深入挖掘其内在精神世界，让郑成功形象超越了历史符号，成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活生生的人。

总之，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记录历史人物生平的书，更是一部照亮前路的明灯，它启发着我们：书写时代不能墨守成规，要敢于突破传统框架，用创新的视角把握时代的脉搏；书写历史不能浮于表面，要深入挖掘历史的细节与真相，让历史人物从尘封的档案中鲜活地走出来；书写人生不能流于平淡，要赋予其丰富的情感与深刻的精神，让人生的故事充满力量与激情。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自信来自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来自对人性的基本认知，那就是人人渴望过具有自我审美的、富有崇高感的、让人尊重的生活，只要一个人体验过这种审美愉悦，破坏性冲动就会自动终止，教育的关键在于唤醒这个审美者，让他强烈体验这种愉悦感。”可以说，在激活传统文化资源、干预社会成员的精神疾患上，郭文斌已经形成了体系性的思想与实践性的方法，它们的核心就是“唤醒”。唤醒，是让主体回到真实的现场，重建与生活多方面真实而紧密的关系，让主体回到自我，体验情感，获得智慧。这已经不是一种理想，而是经过十几年的有效探索和成功实践，是广义教育概念下的课程体系，它建立在现代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伦理学、人类学等学科基础上，特别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努力走出了具有广阔前景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路子。从“寻找安详小课堂”的课程设置、讲授内容、研学项目与现场实验等方面，可以看到多样化的传统文化板块、众多古代思想家的身影和不同特色的书院式教学经验，这些都被郭文斌融会贯通收到“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箱里。因此，郭文斌的系列文化随笔集《寻找安详》《醒来》等被一线的老师、警官在试点的基础上开发成教材，被全国众多学校和监狱使用，为文学承担社会责任作出了贡献。

作为社会建设与人文关怀的实验项目，“寻找安详小课堂”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许多经验与做法需要总结推广，也期待更多有志者加入，以进一步汇集众智，升阶优化。我想，这也是郭文斌的愿望。郭文斌一直希望能通过“寻找安详小课堂”把个体寻找安详、回归喜悦的意义上升到为民族复兴、世界和平培养生力军的高度，这个希望是那么美好，又那么庄严。让我们一起努力。

（作者系中国作协文学理论工作委员会委员、副主任、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



《王垆》，薄暮著，海燕出版社，2025年12月

客体地点，而是一种反复咀嚼、不断回味的主体动作。在《空的是什么》中，薄暮写道：“我把故乡写完了。用右手写的/存放在左心室，更多的空间让给血液/汨汨流淌，像一生中的无数河流/我就是我的故乡。”当诗人说出“我就是我的故乡”时，他已经完成了从地理到精神的最终转化：不是不再需要故乡，而是自己成为故乡。

薄暮随身携带着故乡，故乡也如影随形伴他左右，他在哪里，故乡便在哪里。他与故乡，在诗歌的意义上成为一而二、二而一的存在。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 种子的力量

——郭文斌有关“寻找安详小课堂”创作之路

□汪政

规范与调节着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体现在我们的道德、生活习惯之中，以生活的具体方式参与着人的价值建构和社会观念的培育、塑造、修复甚至重建。此后，他的笔触逐渐聚焦到传统文化中蕴藏的教育资源和生活规范，揭明那些日常之中教会我们如何生活的教诲结构与劝诫模式，通过生动的故事与现实案例，让人沉浸式地体认华夏民族得以延续的情感、规矩与文化范式。

《寻找安详》《醒来》等著述使郭文斌的写作有了根本性转变。他不仅意识到传统文化的意义，更对它的智慧和力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充分的自信，并形成了他的传统文化观、安详诗学、乡愁理论与幸福定义。于是，他的阅读与写作领域也相应地进行了深入与拓展。他的传播方式也突破了单纯的纸质文本。他担任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的文字统筹、撰稿与策划，走进学校、社区、厂矿、军营、监狱、医院，与受众面对面，特别是建立全国性的“寻找安详小课堂”系统……这一切的一切都源于那颗种子。郭文斌由文学而文化，由文化而现实，由现实而实践，一粒文学的种子长成了如今的大树。而且，这棵大树如同榕树一样，根须四出，触地生长，绵延成林。

种子的发芽成长同时需要外部条件，需要阳光、雨露的触动、孵化和催发。从这个角度来说，郭文斌是一个问题意识很强并关注现实的作家，他将自己的写作与社会现实锚定在一起，并以社会现实来调整自己的写作。毋庸讳言，在社会不断进步的同时，我们还面临着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面对每天都在发生的社会问题，郭文斌是敏感的。也许，当他选择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写作方向时，他就相信文学有着疗救社会、安抚人心的作用。而读者的创造性阅读成为推动郭文斌文化教育行动的另一个强大的外部力量。

早在《农历》时期，郭文斌就发现一些家长把这部长篇小说作为了“童蒙养正”之书，

这让郭文斌“对中华文化的功能性越来越体会深刻”。由此，他有了与一般文学写作不一样的创作理想：“我渴望写这么一本书：它既是天下父母推荐给孩子读的书，又是天下孩子推荐给父母读的书；它既能给大地增益安详，又能给读者带来吉祥；进入眼帘它是花朵，进入心灵它是根。”《寻找安详》之后，读者的反响让郭文斌意识到这不是一本书的事了。“我接二连三地得到反馈，几位重度抑郁症患者在读完《寻找安详》后，大为好转。找我的家长成几何倍数增加，把我带进了之前我不知道的‘生活’。我才知道，有那么多人需要一种全新的、可操作的、功能性的‘文化’，在无数次问了自己‘怎么办’之后，郭文斌‘渐渐地，就有了办读书会’的想法”。于是，2012年，全公益实践项目“寻找安详小课堂”落地。

即将出版的《唤醒之路》就以多视角、多文本的方式对“寻找安详小课堂”进行全景式展示。既有集中的报道，有分镜头的深度追踪，也有志愿者的实践体会，更有受教者的心灵敞开。尤其是受教者的觉悟与回望，不仅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小课堂的力量，更为一个个曾经迷路的灵魂终于找到回家的路、开启新的生活而庆幸不已。有着“不如意的前半生”的冯媛从小课堂回来后说道：“我的人生问题在小课堂一次性全部找到了答案。”“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我的心从未如此平静，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对自己更加充满了信心。”……无须再多征引，它们都在这本书里。这些真切感悟和生动的故事让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寻找安详小课堂”的教化之功，而从引入该课程的100多所监狱传出来的改造喜讯，更让郭文斌坚定了文化自信。

十几年的文化教育实践使郭文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愈加坚定自己的信念：“我一直提倡文学要有改造力和祝福性。”“我们的

## 随身携带的故乡

——评薄暮诗集《王垆》

□王士强

对传统生活方式的细腻描摹：母亲用刀柄捣碎大粒盐拌菠菜（《母亲节：菠菜》）、除夕下午擦拭罩子灯的玻璃罩（《罩子灯》）、过年时堂屋摆放烛台与祖宗昭穆神位（《老家》）、铁匠走村串户锻打农具（《新颜》）……在当今快速发展的时代，这些具有前现代特征的文化图景渐次退场，薄暮像一个人类学家，用诗歌为这些逐渐式微的文明形态立档存照。文化转型的残酷之处在于，那些曾经构成日常生活肌理的事物，正在变得不可理解、不可翻译，薄暮的诗一定程度上是在为一种生存伦理和文明形态追念、立传，这样的写作饱含了人文深情。

诗集《王垆》以日常意象为核心，构建起虚实交织的诗意空间。这些意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实体物象，如桂花、蛇莓、楝花、篱笆、长板凳、麦秸垛等，勾勒真实、具体的生活风貌，生动而传神；另一类是主要体现精神属性的意象，如路、灯火、树、阳光、种子、河流等，在实体性之外更重其象征、隐喻特征。薄暮诗歌的意象源自真实生活，朴素无华，却承载着厚重的情感与思考，有很强的生发性与对话性。值得提及的一点是，薄暮善于将乡土意象与工业意象跨界融合，高炉、钢坯、流水线与稻田、农具、草木交替出现，两种意象的碰撞，直观呈现出农耕与工业两种文明的迁移、交融与对峙，让诗歌兼具生活质感与时

代张力。

薄暮的诗歌语言沉静而克制，他很少使用华丽的修辞，面对日益喧嚣的时代，诗人选择了后退与沉默。在《问题》中，他写道：“父亲和我/沉默是最适宜的相处方式。”在《与父亲下棋》中，整个王垆“好像只有我们两个人”，父子之间全程几乎没有对话。这种沉默不是空洞的，而是充满了不必言说、不可言说的情感重量。薄暮诗歌的句式长短错落，节奏舒缓，贴合回忆的心境。同时，他巧妙融入方言词汇、乡间俗语，保留乡土语言的原生质感，让诗歌自带生活气息。质朴的语言并非浅白，寥寥数语便能勾勒场景、传递情绪，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这种语言风格，与其诗歌书写乡土、回望本心的写作主题完美适配，本真、自然、耐人寻味。

《王垆》也是一部关于失去与获得的诗集。薄暮失去的是那个有父母、有炊烟、有鸡鸣狗吠的实体故乡，获得的是一个被随身携带、随时打开的精神故乡，而“王垆”也从一个平平无奇、鲜为人知的村落名，成为一个颇具当代性与辨识度的文化地标。诗集最后一辑的标题“反刍”意味深长。反刍是牛科动物的消化方式，也是记忆的运作机制——那些消失的往事，需要在时间之胃中反复咀嚼，才能转化为精神的养分。《王垆》正是这样一部反刍之作，它告诉我们：故乡不再是一个静止的

## 山乡巨变中的农村日常

——读徐广慧小说集《麦海》有感

□苏有郎

静的村庄》《理想成》《白月亮》等。一路走来，来福村日子虽然过得有些艰难，但人们善良本色不改。人们的心态总体是平静的，是积极向上的，更是日新月异的，是幸福的。她的笔触深扎大地，刻画的是当代中国普通劳动人民的群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来福村”也确实不断地“来福”。李明山身有残疾，却有一颗童心，在下乡干部史红旗的帮助下，由一个太阳照到窗框还慵懒在床的“孩子王”，成为超市老板。他热爱书画，也很容易满足，他以前的日常是从捡来的废纸板或泡沫箱子上写诗作画，在脱贫后他热心做起了公益，成为新时代山乡巨变中一位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型农民。《麦海》中，驻村干部张孝村为了帮助村里百姓实现修路梦想而来，这是小说中最动人的部分。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乡村，在这里具象化了。一朵花的名字》表面写的是留守老人和儿童

的困境，实际挖掘的是人性、人情。儿子在城里斥巨资购房的压力让多奶奶喘不过气来，但她最终穿越生活的迷雾和孙女小溪一起找回并治愈了自己。

徐广慧有意使她的故事平淡又平淡，只看题目就可感受到，如《麦海》《寂静的村庄》《五月的村庄》《小村剪影》等，没有波澜壮阔的宏大场面，没有惊心动魄的矛盾冲突，更没有稀奇古怪的怪诞故事，字里行间，尽是农村百姓的生活日常。小说节奏也慢慢悠悠，如闲庭信步。这在以强调“悬念”“新奇”“好故事”为时尚，尤其是在一个以快节奏为潮流的时代，似乎不合时宜。生活哪有那么多的起伏不定，哪有那么多的紧锣密鼓，生活更多的是平淡、平凡。正是这些散漫的日常生活，留刻着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印记，带给人厚重而深刻的思考。

徐广慧的小说处处充盈着温和的氛围，《白

薄暮诗集《王垆》中，“我的故乡我随身携带”一句直击人心。这句诗在两首诗中出现，一首是：“但我的故乡已不在王垆/我的故乡我随身携带/没有一种速度可以抵达。”（《郑州到除夕有多远》）另一首是：“春天多雨。我的故乡我随身携带/春天多雨。我的故乡空无一人。”（《一到春天 故乡的雨就多了起来》）这一意象几乎贯穿了整部诗集，它以一种悖论式的表达，道出了诸多走出乡村、在城市中漂泊的人与故乡之间的复杂关系：既隔离隔膜又无法割裂、剪不断而理还乱。

“王垆”是诗人薄暮的出生地、成长地，这个位于大别山北麓的小村庄是他全部精神书写的原点。这部诗集并非简单的乡愁抒写，而是在社会转型与文化转型的双重夹击之下对“故乡”概念的深度拆解与重新定义。中国近四十年的城市化进程，制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迁徙之一，数以亿计的人离开故土，进入城市，成为“异乡人”。薄暮是这其中的一员，他的诗典型地体现出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个体经验。“王垆的人越来越少/那条路，早就长满了树”（《路上长满了树》），故乡已是面目全非。时过境迁之后，回到现实中的故乡，作者有了很强的不适感、空虚感和疏离感：“真正的故乡空无一人，从未抵达/每次返程，提着更空的自己/像又一次放弃。”（《还是回去了吧》）“其实，我只是在别人的家和家乡/热烈而新鲜地经过。”（《命名》）个人与故乡之间有了极为复杂、至近至远、至亲至疏的关系。由此，故乡更多的不再是地理意义上的村庄，而成为了一个心理空间、文化空间、情感空间。

诗集《王垆》对正在消逝的乡村文化细节的观照与挽留，令人动容。薄暮诗中充满了

毫无疑问，徐广慧在有意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她把笔触落在太行山东麓冀南平原卫运河畔一个叫来福村的地方，她的小说集《麦海》由10部中短篇小说组成，绝大多数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这个来福村，正处在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之中，有来精准扶贫的县委书记史红旗，有市委办公室派下来的驻村干部张孝村，有以在丧礼上喊号子为业的“杠王”，也有身残志坚的农村青年李明山……一个个鲜活的农村日常，构成了一幅幅新时代乡村图景。

徐广慧讲故事，没有慷慨激昂，一贯平心静气，不急不躁，如行云流水，娓娓道来生活的肌理和底色。她一步人文坛就给自己的作品定下了内敛的基调和韵律。从她的处女作中篇小说《寂寞的村庄》开始，陆续写出《一朵花的名字》《麦海》《杠王》《小村剪影》《青禾》《五月的村庄》《寂

寞的村庄》《理想成》《白月亮》等。一路走来，来福村日子虽然过得有些艰难，但人们善良本色不改。人们的心态总体是平静的，是积极向上的，更是日新月异的，是幸福的。她的笔触深扎大地，刻画的是当代中国普通劳动人民的群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来福村”也确实不断地“来福”。李明山身有残疾，却有一颗童心，在下乡干部史红旗的帮助下，由一个太阳照到窗框还慵懒在床的“孩子王”，成为超市老板。他热爱书画，也很容易满足，他以前的日常是从捡来的废纸板或泡沫箱子上写诗作画，在脱贫后他热心做起了公益，成为新时代山乡巨变中一位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型农民。《麦海》中，驻村干部张孝村为了帮助村里百姓实现修路梦想而来，这是小说中最动人的部分。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乡村，在这里具象化了。一朵花的名字》表面写的是留守老人和儿童

月亮》中万年青对“我”的呵护与照顾；《杠王》中小木头、小石头两个孩子与大人之间的体谅和理解；《理想成》中政府对残疾人李明山的关心和帮扶，李明山对村里孤寡老人的爱心传递；《麦海》中张孝村带着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驻村扶贫；《曲红河》中李二黑与张保全之间演绎的大义与宽容等。徐广慧坦言，她致力于为“祖祖辈辈在土里刨食的人们”发声，探索苦难中的人性光辉，作品中有误会与宽容，有狭隘与大度，还有平淡生活中一些使人痛彻心扉的无奈。她每次开始写作之前，总是“未提笔而泪流满面”。

在徐广慧的故事中，似乎根本不存在那些俗套。当下的农民是李明山，他虽然平凡，但有理想，他爱好写诗，是一个精神至上者；是“杠王”，为了为逝者喊号子送其最后一程，宁愿耽误自家农

业；是多奶奶，虽然生活艰难，有自己的做人底

线；是李二黑，在大是大非面前永远高风亮节……从徐广慧的“来福村”系列小说中，人们看到的是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风貌，他们心地纯净，与世无争，保持着自己的人格尊严。

作为一个出生在农村、书写农村的乡土作家，徐广慧真正做到了扎根生活、扎根人民。熟悉徐广慧的人都知道，她经常下乡采访。2018年冬天，她在村里采访，一星期走坏了一双皮鞋。

小说是反映现实生活的镜子。徐广慧深扎生活，但其小说叙事并没有停留在生活表面，也没有拘泥于故事本身，而是由此拓展开来，构筑出一个个似曾相识又焕然一新的艺术空间。这些从大地上采摘来的素材，经她的艺术加工，焕发出别样的光彩。这些“人人眼中有，人人笔下无”的典型人物和事件，使她的作品既具有强烈纪实性，又不失文学张力。

（作者系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任编辑、记者）